

第四章 正统以外:元代官修 三史《夏国传(纪)》的编撰

如果说《蒙古秘史》关于成吉思汗征伐唐兀剔史事的记载反映的是草原深处的历史观,那么,《宋史》《辽史》《金史》中的“夏国传(纪)”反映的则是中原立场的历史观。显然,后者在中国史学的长河中更为根深蒂固。

就元代官修诸史中所附《夏国传》的编撰体例而言,《文献通考》中关于西夏历史的若干写法可谓是开其端倪。无论从时间先后而言,还是从思想内容来说,《文献通考》的相关记载都可以被视作是三史《夏国传》的窠臼和师范。

第一节 元人何以不为西夏修正史

自《汉书》修成后,以纪、表、志、传为主要形式,以断代为史的史书体例,便成为历代王朝撰修前朝历史的标准形式。这就是所谓的“正史”。

在正统思想的影响下,并不是每一个朝代都有进入“正史”的资格。尤其是对于分裂割据时期,用哪一个政权史来代表中国历史的主要线索或者说是基本面貌是大有讲究的。

元代之前,基于对汉唐以来“国亡史做”政治传统的尊重,辽、宋、金诸朝均没有专门为西夏修史的打算。不可否认,这些朝代也有一些关于西夏史地的著述,但是严格来说,它们都不是能够代表统治阶层正式立场的官修纪传体史书。只有到了再次把中国纳入大一统轨道的元代,西夏史的撰修才有了提上议事日程的可能。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尽管被视为色目种的唐兀人拥有的法律、社会地位,要比那个时代统称为“汉人”的前宋、前辽及前金遗族要高,但是他们的故国西夏,却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与上述三个政权一样的中国正统王朝的名分。由此带来的影响是,所谓的正史序列中没有“西夏史”。

事实上,元代官方史家所梳理的分量无多的西夏简史,只是作为附庸和边缘而被以传记的形式单独书写在这些所谓的“正统史”的末尾。显然,在《宋史》《辽史》《金史》中,西夏史被看作是那个时代也就是10~13世纪中国的非主流历史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和之前历代官方史学处理周边少数民族史的传统做法几乎没有两样。

清代学者曾经严词批评这一做法有失公允。戴锡章说:

西夏建国二百余年,颇怪当时史臣,不为建议,勒成专书,仅附见宋、辽、金三史以传。岂以地处西偏,人为羌族,故外之欤?^①

赵尔巽说:

夏虽僻处一隅,挟其武力,陈经立纪,抗衡宋、辽、金者几二百年,其历世视辽、金为久。开国以后,译圣经、立学校、定新律、修实录、雍雍乎汉唐之遗风焉。而《国史》阙如,可慨也!^②

赵逢源说:

元人修《宋史》,则竟置西夏于外国,曾留从效,陈洪进之不若,遂与高丽、日本同科。辽金二史因之,夫岂欧阳氏进退之意哉?^③

①(清)戴锡章:《〈西夏纪〉自序》,见戴锡章(编撰)、罗矛昆(校点):《西夏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页。

②(清)赵尔巽:《〈西夏纪〉序》,见戴锡章(编撰)、罗矛昆(校点):《西夏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③(清)赵逢源:《〈西夏书事〉序》,见(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506页。

扼腕叹息之余,他们也在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夏史地位在元代官修史局的落寞呢?当时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西夏国史档案尽用蕃书,元人无此宏通之士,因此造成了元朝修西夏专史的困难。吴广成说:

元昊自造蕃书以纪国事,国亡之后,文义莫辨,遂至掌故失传,宋辽金三史有附传而弗详。^①

柯劭忞说:

元昊自制蕃书,摈汉文不用,简册流传,翻译不易,故典章制度,概从湮没。元耶律文正从太祖西征,但收图籍,其中必有《国史》及诸司案牘。第文字殊别,以蒙古、汉人而译唐古特文,无此宏通之士,故有元一代,留意于拓跋氏掌故者最少,亦其势然也。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不修西夏国史乃元廷有意为之。赵尔巽说:

论者以文献无征,咎在制蕃书而屏汉文,岂其然乎?史载元昊立番汉学,乾顺病番学而立国学,仁孝以翰道冲为番汉教授,其文之传于今古,《感通碑》则阳番而阴汉,《掌中珠》以二体为一书,斯皆番汉并行之确据也。况元用夏儒多尔济、高智耀。而多尔济为《国史》世家,元臣石天麟、察罕,尤以精通诸国字书名,通唐古特之文者,固不乏人也。尝读元《进辽金史表》皆称其《国史》,独西夏传只称兼采《夏国枢要》而夏之史无闻焉,则夏史之散亡於元断可知矣。或疑耶律楚材入夏,收其遗书而归。安有至正散亡之理?不知世祖修史,进辽、金而黜夏,其遗书卒未上诸朝史书,张柔之上《金实录》,而《耶律传》无之,此其证也。而修史者亦以夷之载记,遂不遑发故府之牘藏,集遐方之瓠献,草创为之,灭

^①(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凡例》,见(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页。

其国而并灭其史,此不能不援《春秋》之笔以责之也。窃叹辽、金、夏同一亡国,而亡国之史异者,则人为之也。^①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元代舆论对修撰辽、金国史的积极促成。

公(指王鶚)奏言: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上甚重其言,命修国史,附修辽、金二史。^②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西夏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本来就不高,所以它没有资格获得后世为之修撰正史或专史之待遇。胡玉缙说:

元托克托修三史,辽金各为专史,西夏仅附列传。论者议其意为进退,不知辽起滑盐,金兴肃慎,皆受天明命,跨有中原,宜与《宋史》并修。夏虽立国二百余年,而其地初有夏、绥、银、宥、灵、盐等州,后拓至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地而止,局瘠一隅,不得与辽金比也。^③

概而言之,西夏内部史料阙如、西夏政治地位不高、元朝欲亡夏史等,确为元代没有撰修西夏国史的客观与主观因素。

至于元朝人修辽、金、宋三史中的“西夏传”未能采录西夏的实录、国史一类的典籍,不是由于元史臣草率从事或不识西夏文所致,而是由于西夏的实录、国

①(清)赵尔巽:《〈西夏纪〉序》,见戴锡章(编撰)、罗矛昆(校点):《西夏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②(元)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12,中华书局,1996年,第239页。

③(清)胡玉缙:《〈西夏纪〉序》,见戴锡章(编撰)、罗矛昆(校点):《西夏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页。